

编者按 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呈现出新特点,有了一些新发展。2008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所编《日本国际政治学》四卷本出版,分别以国际政治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和越境问题、地区研究和历史研究为主题。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11月出版了该套丛书的中文版。为学习和借鉴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2018年4月26日,由本刊编辑部举办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丛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刊特邀部分与会者及专家,就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及中国和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比较进行探讨,以期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历史研究与国际政治学

王新生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所编第四卷《日本国际政治学: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特定课题本身就是历史,例如,对东亚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研究。国际政治学多以历史上的外交或国际关系作为研

*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871)

究对象,尽管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外交史研究逐渐势弱,而且受社会史影响较重,但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合作却日趋密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地区研究 历史研究 国际关系史

尽管当今世界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但在进行具体的学科研究时却必须具有更为宏观的知识和理论背景。例如,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法学、社会学,均离不开历史学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①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的时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②读过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的四卷本特别是第四卷《日本国际政治学: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后,深感历史研究对国际政治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篇幅关系,本文仅结合李钟元教授的《序章 历史与国际政治学》、细谷雄一教授的《第一章 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川岛真教授的《第四章 东亚国家政治史: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与中国外交史》、服部龙二教授的《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东亚国际政治史》等章节分析历史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关系。

一、外交史与国际政治学

由于国际政治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因而其名称也较为混乱,国内一般称为国际关系学,正如第四卷主编李钟元所说的那样,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一般定位为“国际关系论”的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将“国际关系论”定义为“对反映到国际的各种政治关系中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各种因素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并将“国际法、国际组织论、国际政治论”作为“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关系论”的“三项研究内容”。^① 但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大,而且焦点更多地放在国家之间的各种政治关系,因而国际关系学反而置于国际政治学之下。正因如此,1956 年 12 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

更为重要的是,从古典外交史发展而来的国际史,也称为“国际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因而,国际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不仅早期的国际政治学者本身为历史学家,而且现代国际政治学直接产生于历史研究与外交史,这也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时提议将其名称定为“外交史学会”呼声很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背景就是创建学会的人物以研究外交史、国际政治史的学者为中心,而且最初发表的论文大多为历史研究的成果,直到 20 世纪末依旧凸显这一倾向。1998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三个专业领域各自所占比例依次为国际政治理论(67.9%)、地区研究(55.7%)及外交史与国家政治史(55.3%)。^② 1979 年,日本国际政治学成立 20 周年,细谷千博在总结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时仍然按照外交史与国际政治史研究、地域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日本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③ 即使到 2006 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 50 周年,日本学者在策划四卷本丛书,概括日本国际政治学目前状况时,意识到世界处在巨大变化之中,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难以加以描述,因而增加课题研究一项,四卷各自名称为“作为学问的国际政治”“无国境的国际政治”“地域视角的国际政治”“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并强调了历史研究、地域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相互挑战。由于冷战结束以后资料大量涌现,传统的历史研究式国际政治学遭遇较大的挑战。^④

尽管国际政治学诞生于英美两个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但两国的学术方法存在差异。在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十分浓厚的美国社会科学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书,第 4 页。

③ 细谷千博「総説」、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戦後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国際政治 61、62」、有斐閣 1979 年 5 月、i-iiix。

④ 国分良成、田中明彦「対談:『日本の国際政治学』を語る」、『書齋の窓』2009 年第 5 号、2—15 頁。

中,历史是实证命题的工具,历史方法处在边缘位置。与其相比,英国的国际政治学“受到历史方法论的强烈影响”,“众多的政治学者接受过作为历史学家的训练”,历史方法占据支配地位。^①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包括国际政治学在内的政治学,都是在与哲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社会、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密切联系中得以发展的。在这样的知识传统与环境中,“理论”与“历史”并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思想、哲学与规范方法被视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尽管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取向较强,这种脱离历史的社会科学无疑是美国文化与国情的产物,具备“追求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特点,19世纪中期以来,政治学实现了从“历史政治学”向政治科学的转型,并与历史学分道扬镳,走向成为“科学”的道路。计量模型、系统分析、功能主义、行为科学等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也对国际政治学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近年来,国际政治学正处于建构主义及批判理论、重视认识、价值、文化等因素的后实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理论发起挑战而引发的“第三次论战”之中,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学在经历了“欧洲化”“去欧洲化”后,正出现可称之为“再欧洲化”的现象,在这一现象中值得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意识等概念再次走上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舞台。^③

外交史、国际政治史立足于历史与理论、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基础之上,并从政治的视角分析历史事实。因此,国际政治学的各种理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历史研究也对国际政治学的许多理论有着重大影响。随着外交史料的公开及方法创新,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已经成为趋势。实际上,战后日本学术界一直坚持其研究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取得较多优秀成果。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自创始之日起不断强调引用公开史料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出自对战前日本外交失败的反省,特别重视外交史的研究。1959年5月,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10—11页。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旨在对太平洋战争的开战外交史进行实证研究,亲自出任研究部长的理事长神川彦松表述的立场为“在研究太平洋开战外交史的计划中,我们的目的就是将以今天可能得到的基础史料、有关事件的幸存者的回忆等为根据,竭尽全力对日本何时、通过何种具体过程最终走向开战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研究成果《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四年后出版,该书强烈反映了当时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关心,人们可以从史料实证主义、国家主义、政策决定过程理论中感受到浓厚的学术视角色彩。这既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也推动了其后日本外交史研究的飞跃式发展。^①

20世纪70年代末,有两本书拓展了日本外交史研究传统的背景及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即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坂正尧的《古典外交的成熟与崩溃》和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永井阳之助的《冷战的起源》,前者描述了从维也纳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传统外交史,后者利用美国公开的史料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其问题意识均来自现实国际政治的错综复杂、眼花缭乱,也就是中苏对立、中美缓和、石油危机等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不断出现、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作用的现实背景。

冷战体制结束后,基于美英外交文献的日本国际政治史研究取得飞跃式发展,不仅研究对象逐渐转向冷战后,而且开始探索战后日美关系的本质,因为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消失,以史料实证主义探讨战后日本日美关系史的优秀著作相继问世,其中代表作是五百旗头真主编的《日美关系史》(2008年)。另外,利用第一手资料、以更宽广的时间研究国际政治史的学术成果日益增多,除英美外交史的研究外,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史也有相当的进展。^②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23—24页。

② 同上书,第29—30页。

二、国际政治中的历史

国际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特定课题本身就是历史,例如对东亚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研究。尽管日本的近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大多以中国为中心,但其视角却来自区域外,正如该研究领域核心人物川岛真所说的那样,“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研究主流是,即使研究对象是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也从日本、英国、美国等视角首先设定课题,随后将中国的史料运用于其中。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自身的外交档案解密并不充分,此外,中国本身也被认为是从属性的行为体”。最后一句话川岛引用的是唐启华之观点,但需要商榷的是,“外交档案解密并不充分”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倒是中国从属性行为体的身份值得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川岛也承认“在东亚国际政治史中,中国始终是舞台,即使是从属性的,中国也始终是登场人物之一。而中国是如何从属的,如何次要的,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明确,总之,将中国设为空白的同时叙述东亚国际政治史会存在许多困难”。期望“今后,以从中国视角考察的中国外交史为基础的东亚国际政治史与以往从外部考察中国的东亚国际政治史这两种背景将时而结合开展研究,两者将各自或结合起来描述东亚的国际政治史”。^①

实际上,理解这种现象并非十分困难,作为地区国际关系体制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中国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册封(朝贡或朝贡贸易)体系是其核心,农业文明及华夷秩序是这一体制的时代和思想基础。但近代工业文明及其基础之上的条约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于西欧,随之而来的扩展效应波及其他地区,“挑战”与“迎战”的局面在东亚地区格外激烈,其国际政治史研究的中心是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冲突与对抗,同时,由于伴随近代国家及国际之间国家体系的形成,民族主义成为抗争的主旋律,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内部整合所具有的局限性,因而,在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积累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66—67页。

正如川岛所说,中国的外交史研究从清末已经开始,但大多使用中国方面的资料,用中国视角构建历史,到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正规的历史研究,在此之前是西方学者从外部视角利用海关、传教士、外交官等留下的资料研究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其代表是马士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三卷本著作,其利用英国国会及政府报告和英国《外交关系》等列强方面的文献,描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整体情况。^①但民国成立以后,以清华大学蒋廷黻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外交史新标准,主张撰写外交史必须详尽利用各国的相关资料,在方法与内容上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外交史研究的重视综合分析及整体把握历史的新学派。特别是蒋廷黻教授编著的《评〈清史稿 邦交志〉》(1929)、^②《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1931,1934)^③、《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④、《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⑤等为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

尽管战前日本人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大多为时事解说性言论,但也存在基于中国方面史料进行的实证研究,其代表是矢野仁一。另外,田村幸策等人从国际法学视角对中国缔结的条约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并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但“这些研究与其说是中国外交史,更侧重于‘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史’这一侧面。”^⑥

川岛认为,美国学者费正清同时继承了马士和蒋廷黻两个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了两册书籍,勾画了“条约体制”与“朝贡体系”之间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冲击—反应”的范式,与现代及传统的冲突这一观点相关联,不仅对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关系,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也产生了强烈影响。川岛高度评价“台北学派”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研究基础建设方面,即对外交档案的整理与刊行极大地刺激了世界的外交史研究,而且其研究工作成为世界的研究中心。与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外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60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本,民国珍本丛刊)》,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

③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本,民国珍本丛刊)》,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

⑤ 同上。

⑥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72—73页。

交史研究或中国的国际政治史研究,重视的是基于侵略与抵抗、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历史观的叙述性、故事性研究。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20世纪前半期外交史的研究,但先评价、再叙述的历史描述方法本身并没有改变。^①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急速发展,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出现一种学术趋势,即中国留学生同时使用中国史料与日本、欧美史料,从国际社会中的中国这一视角描述历史。在日本,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学者讨论了亚洲的地区秩序及朝贡贸易理论。进入21世纪后,探讨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在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理论及滨下的朝贡贸易理论进行批判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关注中国海关研究的国际政治史与关注档案研究的中国外交史研究相互影响,研究方法也相互接近,但利用中国外交档案的研究仍然不足。在此阶段,应相对化那种非此即彼的方法,在认清对象的同时互相对话,摸索前行。^②

尽管川岛强调档案资料对研究中国外交史的重要性且身体力行,^③由于时间越近外交档案解密越少,因而导致国际政治学研究大多倾向理论推演,且容易出现颠覆性见解,但无视历史背景的国际政治研究容易出现偏差。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批判性反思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给其后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有学者写道:“由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拒绝侵略战争责任的谢罪、赔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法律解决’不可能实现;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情报战活动和‘遭遇激战’式的政府间谈判,两国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既然不能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历史连续性结构也就决定了中日关系仍然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特征”。^④

尽管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做出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78—79页。

② 同上书,第82—85页。

③ 《我是如何进入中国近代外交是研究的:川岛真教授访谈录》,《现代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

④ 刘建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更多的让步,例如战争状态的结束以“不正常状态的终结”表述、删除“赔偿请求权”中的“权”字、日台断交也是按照日本希望的方式实施、共同声明没有涉及日美安保和“台湾条款”等,^①但在日本也有批判性评价日本政府邦交正常化政策的声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原外交官冈崎久彦就认为,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抛弃台湾,致使日美协调出现混乱,给予中国各个击破的机会;中岛岭雄更是批判说,在当时中苏对立之际日本未能迫使中国让步,反而抛弃台湾,田中政权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落入中国圈套的“拙速外交”。^②

客观地讲,上述国际政治学式的结论并非客观、准确的历史性定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通过“政治解决”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是两国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虽然也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更多的是后来主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导致。尽管如此,从日本方面来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策过程仍然值得研究,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外交档案的公开及当事人回忆录或日记的出版,增加了重新探讨的必要性。

三、历史中的国际政治

实际上,国际政治学多以历史上的外交或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正如服部龙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国际政治史是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一。如果外交史学家今天仍被两战期间的国际政治所吸引,不仅是由于人类经历了未曾有过的大战争,也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关系到现代国际政治根基的各种问题,即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崩溃,帝国的重组,国际组织的建立与局限性,超越国境的人员流动及贸易等各种关系网络,脱殖民地化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日中提携’的失败等。成为现代国际政治基础的潮流从这一时期起开始覆盖世界”。^③

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两次大战之间东亚国际政治研究更是重点,近年来一个显著学术倾向是,利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的第一手史料、将

① 毛里和子「日中關係史」,岩波書店2006年。

② 岡崎久彦、中島嶺雄「日本にアジア戦略はあるのか」,PHP研究所1996年。

③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86页。

中国作为主要行为体进行描述的研究增多,但是,运用典型的国际政治史方法进行的研究却没有与史料解密的速度同步发展。尽管目前利用各国史料进行全面描述国际政治全貌的合作研究的事例逐渐增加,特别是中日美有关侵华战争的国际合作研究,也出现了从华南、台湾直至东南亚及南方的国际合作研究,但这种合作研究尚需推进。^①

服部教授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亚洲国际政治可以分为三重结构:第一是与中国有关的不平等条约及殖民地等19世纪以来的问题,第二是“二十一条”“山东问题”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悬案,第三是中国重新统一及去殖民地化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趋明显的潮流。同一时期的日美关系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围绕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性的紧张关系,其次是围绕亚洲的权益与理念的调整,最后是围绕种族问题的社会文化冲突。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华盛顿体系是日、英、美协调外交的结果,但其基础是中国被置于从属地位和苏联被排斥在体系之外。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在该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的突出成果,例如币原喜重郎外交典型地体现了华盛顿体系的特点,在中国统一及建立秩序时奉行了不干涉政策,在日本人移民美国和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基本尊重华盛顿条约的精神。即使在田中义一执政时期,与中国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达成了不少妥协。^②

服部教授进一步指出,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是列强可以基本维持在华权益,经过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后,日美英的对策各不相同,是华盛顿体制本身出现了松动,九一八事变后币原外交的变质与崩溃标志着日本拉开了终结华盛顿体制的序幕,承认“满洲国”、退出国联、签订日德防共协定、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学术界在这些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例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如何恢复受“中东铁路事件”影响的该铁路功能;因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对大豆需求的减少;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内部意见虽然不统一,但在政策上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通过上诉国联寻求“国际解决”;日本退出国联后,其委任统治还在继续沿用“与国联保持合作关系的非加盟国”的名义,南洋诸岛也最终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88—92页。

的战略据点；如同“天羽声明”表面化那样，重光葵外务次官实际上越过广田弘毅而掌控了对华政策；卢沟桥事变的实证研究不断发展，对事变的评价也有分歧，等等。^①

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日三国同盟、日本南进政策、日美谈判等，日本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出版了侵华战争前期复杂的讲和谈判的研究成果，也有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研究日本走向开战的国家政策及关注主要外交决策者的构想。另外，较为显著的学术动向是合作研究的诸多成果，例如有关战时重庆政权、上海的占领政策、兴亚院的活动等领域的研究。在日美谈判问题上，近年来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对情报的关注度日益增加，日本也在相当程度上破解了美国国务院等的电报，在破解密码方面日本试图与匈牙利、德国、芬兰等进行合作，虽然日军似乎在搜集情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却远远没有充分分析并利用这些情报。^②

服部教授最后总结到，华盛顿体系就亚洲国际政治史而言具有双重性：第一，日本基于华盛顿会议精神，将与美英的协调作为对外关系的基轴，因此，日本的大陆政策相对受到限制；第二，日美英的协调具有强烈的维持现状的性质，列强在中国的权益通过华盛顿会议基本得到维持。因此，在中国收回国权并走向统一之际，日美英在对华政策上无法达成充分的一致，各国的秩序构想出现分化，日本未能超越两国关系的框架以对世界局势进行总体判断的方法，走向了亡国的道路。^③

显然，服部教授是将国际政治学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实证性考察，其结论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尽管国际政治学理论也不断发生变化，甚至有回归历史研究之说，^④但如果过度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性，则难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例如，尽管新现实主义理论历史性地论证国家不是因

① [日]李钟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历史中的国际政治》，第94—95页。

② 同上书，第96—97页。

③ 同上书，第98—99页。

④ 遠藤誠治「序論 歴史的文脈の中の国際理論」、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175号、2014年3月、1—13頁；平田準也「国際関係理論の歴史的展開——論争・対話・覚醒」、早稲田大学大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ソシオサイエンス』114号、2008年、188—202頁。

相互对抗而集结势力,而是根据各自优势形成的“专业化”组织,其结论只能是“非历史性”或“反历史性”。^①

这样的事例经常可以看到,如过去一度十分流行的观点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以民促官”的方式,也是通过民间交流不断扩大得以实现。具体说来,由于战后冷战体制的形成,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台湾当局作为媾和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处在无外交关系的状态,因而,两国的交流及贸易只能通过民间交流方式进行,而且正是在民间交流的推动下,最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目前的看法是“‘民间交流’是在中日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民间交流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是一种量变的‘积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尼克松的访华乃至中国的主动,田中角荣即便当了首相,也没有访问中国的理由和勇气。”^②

总而言之,国际政治学与历史研究是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所谓“理论”是指国际政治学的范式,所谓“历史”是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尽管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外交史研究逐渐势弱,而且受社会史影响较重,但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合作却日趋密切。对那些关注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学者来讲,“全球化社会复合式相互依存模式”具有较强的范式作用。相反,历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检验对国际政治学者也具有许多启发意义。尽管历史研究不使用任何理论也可以成立,但即使“叙述性”历史也需要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领域的理论,“分析性历史”更需要政治学方面的范式。在外交史研究方面,决策过程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分析政治家行为的背景和互动需要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即使在历史研究领域,也有不同的理论或方法。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历史社会学向国际关系论扩展,到80年代国际关系论反而向历史社会学渗透,而历史社会学又分为“韦伯型历史社会学”和“福柯型历史社会学”。^③

① 篠原初枝「外交史・国際関係史と国際政治学理論国際関係論における学際アプローチの可能性へ向けて」、『アジア太平洋討究』No.11(October 2008)、185—198頁。

② 王雅丹:《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世界知识》2012年第23期,第24—26页。

③ 大賀哲「国際関係論と歴史社会学——ポスト国際関係史を求めて」,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編『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 特集 歴史社会学』,2006年3・4号、37—55頁。

如同前述,国际政治学有回归历史研究的趋势,正如冷战史专家卡戴斯指出的那样,政治学者喜欢预测或政策建议,而历史学者则偏爱通过事例研究“寻找变数”。^①当然,也不是完全不使用理论,例如,入江昭除使用国际政治理论外,也援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只是不太明显而已。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也是如此,尽管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各自具有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但具体到研究课题仍然需要拥有特定事例相关的详尽资料,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方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正如有学者最近强调的那样:“历史是一座富矿,是今人取之不尽的研究材料和思想理论来源,国际关系学应不断地往返于现实和历史之间,往返于历史与理论之间。”^②

① 篠原初枝「外交史・国際関係史と国際政治学理論国際関係論における学際アプローチの可能性へ向けて」、『アジア太平洋討究』No.11(October 2008)、185—198頁。

② 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